

一 我国医药学的 起源与发展

1. 古代医药保健活动的起源

我国医药保健活动起源古远，以历史发展的规律来分析，毋庸置疑，医药学也象其它文化科学一样，来源于劳动实践。劳动创造了人类，劳动使人类创造了自己的一切文明，那么藉以延长自身生命活动的医药学，也必然是在劳动过程中形成、发展和传播的。

由于文字的产生远远晚于人类的医药保健活动的产生，所以不可能有历史上当代的文献资料证实医药保健活动起源于何时。我们仅能就战国以来幸存的文献及有关医药起源的传说，进行历史的、客观的、科学的分析，作出结论。而这些分析也不断地被近代

陆续发掘、出土的远古时代人的遗迹和实物所证实。

古代文献记载医药的起源，多集中在炎帝（神农氏）、太皞（伏羲氏）、黄帝（轩辕氏）时代，那不过是在父系氏族公社时期，距今仅四、五千年。可是我们知道医药保健活动是在劳动实践中逐渐丰富的。人类为了生存，与大自然斗争，由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，其间的很多活动都与卫生保健有关，进而由无意识的保健发展为有意识的医疗活动，这一过程是可以上溯到数十万年以前的。

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距今六十九万年前原始人类的遗址，有几处山洞中存留着一些灰烬。最厚的一处达六米，而且灰烬中有许多被火烧过的兽骨。这说明当时的人已经能掌握和使用天然火了，经常用火烤兽肉。由于熟食可以缩短消化食物的过程，而且火能御寒、照明、驱散山洞中的潮湿，改善了居住条件，自然也就减少了疾病，增强了体质。火的使用是人类从自然界获得解放的一个巨大的推动力，人类利用火也成为卫生保健活动的重要的进步。在后来漫长的历史

中，人类又发现火可以祛除病痛，逐渐有了利用“灸焫（ruò若）”方法治疗疾病，这就是现在艾灸疗法的来源。

古人类最早运用抵御猛兽、猎食为生的工具就是石块。八十万年以前的蓝田人化石相同的地层发现有大三棱形尖状石器，而北京人制造的石器更有着明显的进步，他们所用石料是经过选择的打制的也更为规整而且有刮削、砍砸、割刺等适用于不同目的的石器。而针刺疗法最早的器具就是砭石，《山海经》记载：“高氏之山，其上多玉，其下多箴石。”箴石就是在战国以前发现的古代针具，也有认为是制作骨针的工具。箴就是针，箴字从竹，也表示了针具的发展曾有竹制的阶段。到目前大量出土的古代文物中，就包括有石针、骨针、陶针等，证实了用作治疗疾病的针术，在石器时代有其雏形了。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，针具及针术也在不断地进步，直至冶炼术发明后形成金属针具。《灵枢经》记载有“九针”就是有九种不同形状、不同用途的针具，可以针刺、割治、放血、排积液积脓等，用途非常广泛，说明

在战国时期针术治疗方法是多样的，水平是相当高的，如果生产力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，这个进步是不可能实现的。

从现存的医籍和有关文献分析，针灸著作最早也最完善，上古时代治病总是先考虑用针灸术，可能针法和灸法是我国最早形成的治病方法。而它们的产生和发展完全是建立在古代人劳动实践的基础之上的。

酒的出现是远古的事，《说文》载：“医，治病工也。……医之性，然得酒而使。”酒的古文是酉，从“醫”字看，说明医与酒是有联系的，早在《素问》里就有黄帝与歧伯论制造醪醴的记载，“醪醴”就是汁滓酒。

原始人群生活的环境非常恶劣，原因是当时他们改造环境的能力很差，北京人住在龙骨山的天然洞穴中，据考证有一个时期曾被鬣狗占据了洞穴，还曾经因大水淹没暂时迁居，而且洞顶不断地坍落，只好又在洞内寻找另外可住的部分。生活这样的环境中，他们的寿命很短，通过对发掘出来的二十二名猿人遗骨化石进行研究，五十至六十岁只有一人，十四岁以下的有十五人。在后来漫

长的劳动过程中，人们逐渐认识到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人体的危害，认识到寒冷、潮湿、炎热、风雨，以及虫兽的侵扰，都可以使人发生病痛。由于劳动经验的积累，创造能力逐步提高，他们不再安于适应自然环境了，而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改造环境，所以有了衣服和居所的发明，并不断改善。由裸身生活，进而用兽皮、树皮御寒，到发明缝制及原始的纺织劳动，而创造出唯人独有的衣服；由洞居生活，进而构木为巢栖身树上，到土窖、地窖，发展为木屋、石屋，都表明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，人们的生活条件在逐步改善。而这些与大自然抗争的每一次进步，其实都是以卫生保健、防御疾病为目的的。在这一系列目的明确的劳动实践过程中，人们也就逐步认识了致病因素与防病方法。

类似的保健方法还有原始的舞蹈。原始人由于工具粗糙，狩猎能有收获是很不容易的，因此他们获得较大的猎物，高兴的情态可想而知，模仿动物跳跃、飞翔的欢快运动以表示胜利的喜悦，原始的舞蹈也就产生了。舞后自然身体暖和，精神欢愉，也就把它作

为生活内容的一部分了。很久以后，人们从中发现类似的运动可以强健筋骨，就把它作为健身防病的一种方法，导引术就是这样产生的，导引术是古代一种体育锻炼形式，就象现在的健身体操加入呼吸调节。古代的舞蹈和导引都常常模仿动物的姿态，就反映了它们之间的血缘关系。（插图 1）



图 1 导引

古代医药知识的积累也是与人类的生产、生活实践息息相关的。采集野果是远古时代人类生活来源之一。从盲目地采集，到有选择地采集和食用，这一过程就说明人们已经对一些有毒性的植物有了感性的经验，并代代相传。哪些植物可以致泻，哪些植物

可以致吐，又有哪些误食后会发汗，这些认识就奠定了药物治疗的基础。随后由采集野果到发明农业，由狩猎发展为渔牧业，而金属冶炼时代的到来，又积累了矿石性能知识，于是植物、动物、矿物的一些偏性、毒性被人们逐渐认识，这实际上就是药理学知识。随着人们对疾病认识的加深，这些吐、泻、汗等偏性也就被作为医药而用于治疗疾病。所以说医药学也是来源于劳动实践。

从以上灸、针、导引、医药等起源的分析中，还可以发现一个特点，古医药卫生的知识，是各地的劳动群体在生产、生活实践中，逐步形成，互相交流的，即不是一时一地的发明。所以《素问·异法方宜论》中说：“砭石者，亦从东方来”；“毒药者，亦从西方来”；“灸焫者，亦从北方来”；“九针者，亦从南方来”；“导引、按跷（按摩）者，亦从中央出也”。

医药学并不是某个人的发明，但在医药学发生、发展、传播过程中，个人曾在某些方面，做出过突出的贡献，人们也会世代地纪念着他们。在古代文献中保留着一些

某人发明医药的传说，其中有些就是基于这种原因。

2. 中医学发展梗概

我国医药学的发展，也象其它学科一样，与各历史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。虽然它在不断地进步，但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，这要从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——夏王朝说起。

夏、商两代是我国奴隶制度产生与发展的时代。农业、畜牧业和手工业的生产都有着突出的成就。特别是起于夏末，盛于商周的青铜文化，以及殷商业已成熟的甲骨文字，标志着我国高度的古代文明。在医药方面也有一些进步。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，发现当时人们对疾病已有明确的分类，所涉的范围已包括今天的内、妇、儿、外、五官等科疾病，疾病名称有 20 多种。有些病名的发明在医学史上是很有意义的。如龋齿就是有关该病的世界最早记录。当时有“疾年”的说法，指多病之年，是有关流行病的最早记录。在治疗疾病的药物和方法上，也有一些

经验积累。但夏、商医药学发展显得比较缓慢，与生产、文化的突出成就极不相称。其直接原因是夏、商时代医疗活动是控制在巫师手中的。巫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，至商已成鼎盛之势，他们参与包括国家大事在内的一切社会事务，有着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。在万事求助于巫的时代，巫、医一体的“巫医”自然也应运而生。巫医之所以能取信于人，是因为他们在巫术的掩饰下，也施行医药治疗。这样就形成了医药为巫服务，而巫师控制了医药的可悲局面。因此在夏、商两代，医药学戴着沉重的神权枷锁，不可能有突破性的发展，使医学理论的产生至少推迟数百年。

西周至春秋，奴隶制度从兴盛走向衰落，战国时代的各诸侯国陆续完成了封建制的过渡，至秦灭六国后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。周初由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，社会分工更趋于专业化。《周礼》所设的政府机构已将巫师与医师的职责明确分开，从此有了法定的医政组织和专职医生。周代的一些书籍中，反映了医药学已积累了丰富的

经验。如《周礼》记载了医学分科，粗略的诊察疾病和内治、外治的一般方法。《诗经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山海经》等记载了丰富的药物知识。尤其是春秋时代，医家对巫术展开了坚决的斗争，逐渐摆脱了巫对医的束缚。“阴、阳、风、雨、晦、明”六气致病学说的出现，强调了医学本身的科学性与独立性，为战国至秦汉时期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，奠定了基础。

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大批简帛医书，共十四种，三万多字，经络、脉法、医方、养生、胎产无不涉及。据考证，这些医书为春秋至秦汉之际各时期著作。其中《足臂十一脉灸经》和《阴阳十一脉灸经》，是迄今发现的有关经络的最早文献。

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，汉初尚能见到先秦的医著有医经七家，计二百一十六卷。然而后世仅存《黄帝内经》十八卷。这就是至今仍被奉为医宗正典的《灵枢》和《素问》（各九卷八十一篇）。《黄帝内经》反映了我国医学理论体系已经形成。两千多年来，祖国医学的基础理论尽管在不断地充实和发

展，但皆未离《内经》其宗。《内经》全面地论述了人的生理、病理、诊断、治则、治法及人与自然的关系。中医的阴阳、五行、脏腑、经络、病因病机等理论，皆源于这部医学经典。它反映了中医学整体的、宏观的学术特点，是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依据。此后，我国最早的药物学专著《神农本草经》也相继问世。它象《内经》一样，并非出自一人一时之手笔，大约是秦汉以来许多医家的经验结晶，最后成书于东汉，总结了先秦两汉的药物学成就。以后历代的本草著作都是在它的基础上扩充而来。

东汉时最重要的医学成就是张仲景《伤寒杂病论》问世。张仲景在以往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，创造了以“六经辨证”论治伤寒病、以“脏腑辨证”论治杂病的诊疗思想，形成了理、法、方、药密切联贯的辨证论治体系。《伤寒杂病论》成为历代医家必须研读的医学典籍。东汉的另一位名医华佗的麻醉术和外科手术，对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，在世界医学史上也堪称为先驱。

魏晋至唐，医药学有了全面的发展，对

临床医学尤为重视。晋代针灸学与脉学的发展较为突出。王叔和搜集了前代医家有关诊脉方法的阐述 结合个人临证经验 著成《脉经》十卷。把脉象分为二十四种，明确了切脉诊病的方法，使后世脉学有所依据。皇甫谧所著的《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》(简称《甲乙经》)，为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，由于该书以切合实用、便于掌握为宗旨，故对普及和发展针灸学做出了重要贡献。《甲乙经》后来还传到国外，在世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
隋朝医家很重视对病因、证候学的研究。巢元方等人所著的《诸病源候论》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，全书论述了一千七百多种病候，成为后世病名研究的模式。如妇产科疾病就分为妇人杂病、妊娠病、将产病、难产病、产后病五类，几乎包括现在中医妇产科的所有病症。对流行性传染病、寄生虫病，甚至某些过敏性疾病都有一定的认识。对消渴(糖尿病)、脚气病、麻风病，描述已经非常详细，为世界先列。该书的内容还反映出当时已经能做人工流产(妊娠欲去胎候)、肠吻合(金疮断肠候)、拔牙(拔齿损脉候)等手术。

自东汉以来，方书盛行，很多医家都留下了宝贵的医疗用药经验，其影响最大者当推《肘后救卒方》。它不但切合实用，而有些内容为世界首创，如有关恙虫病、天花病的描述，用狂犬脑防治狂犬病等，在医学史上有重要地位。唐代的《千金方》、《外台秘要》两部巨著，成为集东汉以来临床验方之大成的代表作，标志着唐以前临床医学的高水平面貌。

宋代由于朝廷重视医学，设置了校正医书局，加之文士习医成为风尚，以及活版印刷术的发明，给古医籍的校订刊行工作提供了良好条件，所以对古医籍的整理工作很有成就。当时的方书、本草著作也大量刊行。如最早的很有影响的妇科专著《妇人大全良方》、儿科专著《小儿药证直诀》、外科专著《刘涓子鬼遗方》、眼科专著《银海精微》等均出于宋代。宋人宋慈所著《洗冤集录》为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，历来受到国际法医学者的高度重视。然而宋代在医学理论上建树不多。

金元时代，社会动乱，百病丛生。医者

多有“古方难治今病”之感，所以从临证实践出发，对医学理论屡有创新。因见仁见智，遂有医学派别之分，其最杰出的领袖被称为“金元四大家”：刘完素、张从正、李杲、朱震亨，各树一帜，他们的“主火”、“攻邪”、“脾胃”、“相火”等学说，打破了宋代医学界执着顽固的沉闷空气，推动了后世医学的发展。此外，元代骨伤科有着较高的水平。危亦林的《世医得效方》是我国最早的，也是很有世界影响的骨伤科专著。其中麻醉术的施行有具体的描述。用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椎骨折，属世界首创。

明代医学受金元学术影响很深，但多无门户之见，故学术空气活跃，多有建树。其佼佼者如薛己、孙一奎、张介宾等皆是学验俱丰的大医家，针对金元以来用药时弊，创立了温补学派，重视人体正气、阳气。明代本草学成绩斐然，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举世瞩目。明末瘟疫流行，死于误治的很多，遂有吴有性悉心探究瘟疫病源，著《瘟疫论》，提出“杂气致病”的理论，为温病学说的产生开辟了新的思路。至清代叶桂、吴

塘等人创立“卫气营血辨证”、“三焦辨证”，用以治疗温热、湿温病，基本上解决了流行性传染热病的治疗问题，进一步地丰富了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。天花病自公元一世纪传入我国，危害甚大，死亡率极高。早在明代我国就发明了“人痘接种”的预防方法，但直到清代才得到推广，并传于海外，这是对世界医学的一大贡献。十八世纪传到英国后，才改进为今天所用的更为安全的“牛痘接种法”。

明清时代，由于闭关自守，很少接受西方自然科学成果，以刺激中医药的自身发展，这也是我国医药学疾起于先，却没有得到充分发扬的重要原因。

二 中医学基本理论与诊治特色

春秋、战国时代中医学理论已基本形成，至两汉已具有很高的水平了，它的重要标志就是《黄帝内经》（包括《素问》、《灵枢》）的问世。两千多年来《黄帝内经》有力地指导着医疗实践，被奉为经典著作。以后历代医家虽有某些成就，但从理论上说皆未离其宗，都是在《内经》的基础上的发展。下面我们来谈谈中医学理论的基本内容。

1. 古代哲学指导的思想方法

古人说：一个秀才，半个医。可现代的比较年青的知识分子并非能很容易地学进中医。这是因为现在的知识结构不同。中医学理论是基于我国古代哲学理论发生和发展的，它与现代医学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学术思

想体系。

春秋、战国时代，由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，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，学术界也出现了“诸子蜂起，百家争鸣”的空前活跃局面。我国的医学吸取了各学派哲学思想中确能指导医疗实践的合理部分，形成了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的中医理论体系，推动了自身的发展。现在我们就看一看古代哲学对中医理论的重要影响。

（1）阴阳学说

传说伏羲氏“定天地，分阴阳”。其实阴阳概念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，且不断深化引申的，当归功于儒家的经典《周易》。该书一般认为是殷末周初之作，它本来是古代卜筮（shì）之书，但古代学者却从中提炼出“阴阳”这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，用以解释自然界万物变化的一般规律。甚至战国时期还形成了“阴阳家”这一学术派别。医学自然地也把“阴阳”作为基本概念吸收进来了，因此中医学者非常重视《易经》，直到清代，医学界还有“不知《易》者，不可